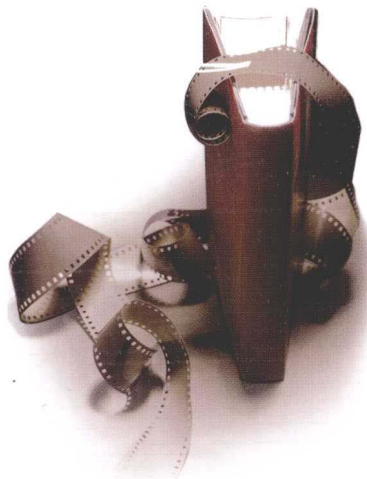


经典解码：

20世纪中国文学与电影

黄万华 刘方政 马兵 等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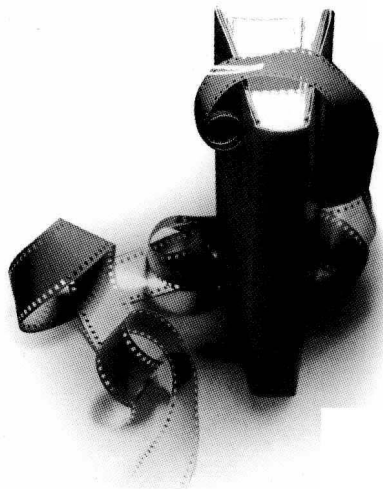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经典解码：

20世纪中国文学与电影

黄万华 刘方政 马兵等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典解码:20世纪中国文学与电影/黄万华,刘方政,马兵等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5

ISBN 978-7-301-20562-4

I. ①经… II. ①黄…②刘…③马… III. ①中国文学-文学评论-20
世纪-高等学校-教材②电影评论-中国-20世纪-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
I209.91②J9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76590号

书 名: 经典解码:20世纪中国文学与电影

著作责任者: 黄万华 刘方政 马 兵 等著

责任编辑: 张雅秋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0562-4/1·2455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2

印 刷 者: 北京世知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开本 18印张 305千字

2012年5月第1版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2.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序 言

山东大学文学院黄万华教授和他的同事编写了这本通识课教材《经典解码：20世纪中国文学和电影》，嘱我写序，我想借此机会谈谈对通识教育的看法。

近年来，很多大学都开始注重通识教育，纷纷开设这方面课程，编写相关的教材。这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新趋势。但为何要进行通识教育？怎样开展？和专业教育什么关系？教学效果如何？都值得认真检讨。现今所谓通识教育的做法大致有三种。一是有些学校把通识教育等同于公共课，以前只有政治课是公选的，现在加上一些诸如文学艺术、琴棋书画、文化讲座之类，并没有通盘的考虑，多是因人设课，学生也只凭兴趣选。二是有些大学规定文科生都要读点简易的数理化，理科生要学点传统文化等等，希望就此“跨学科”，文理打通，可是就那么几种课程拼盘，打通并不容易。三是部分大学一二年级不分专业，可以任意到各个院系选择上喜欢的课，到了高年级才决定上哪个专业，这样容易满天星斗，到了专业阶段，底子并不厚实。三种办法各有得失，还得多试验才能决定是否合适。但无论哪种办法，和通识教育都还有些距离，~~可能~~对通识教育这种新事物的认识有偏误。

现在为何提倡通识教育，~~教育~~有两种代表性的认识。一种认为这些年扩招，学生数量大增，精英教育~~必~~转为平民教育，不得不适当降低水平，搞通识教育。这种看法反映了~~高校的实际~~，有些道理，但其所理解的通识教育，就等同于降低水平的一般教育了。第二种看法认为现在专业分工太细，学生过早进入专业训练不利于发展，想通过通识教育，让学生多一点跨学科的知识积累，为创新人才的培养打基础。

这些看法虽然不无道理，却又过于“实际”，未免短视，并不符合通识教育的本义。纵观世界上一流大学的教育经验，通识教育应当包含这么几层

涵义:这是面对所有大学生的教育;又是相对专业教育而言,属于非专业、非职业性的教育,与专业教育可以互相补充;还有,这是全人教育或博雅教育,通过接触人类文化的精粹,在人文、社会、自然科学等领域获取通识,培养有教养、有能力、有责任的公民,最好是那种有通识见识、博雅精神和优美情感的人。这样来定位的通识教育,就不只是课程的调整补充,更不是来些拼盘点缀,而是实行一种更利于培养健全人格和博雅精神的教育理念。

事实上,这些年提倡通识教育,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教育效能的失望。多年来,我们的教育被赋予太多政治、经济的功能,过分重视专业训练,大学校园里缺少自由宽松的精神,加上拜金主义的干扰,更急功近利,学风浮躁,人格教育和人生教育都是短板,别说出人才,就连培养正常的有道德的公民都有些困难了。正是这种残酷的现实,迫使我们大学教育进行反思,希望能通过通识教育探寻一条新路。但这是新事物,还得认真领会其先进的理念,克服急功近利的思想,让改革的路子比较正,不是花样翻新,不是立竿见影的“工程”,而是有长远考虑的教育大计。

如果承认通识教育是对所有大学生的全人教育或博雅教育,那么课程设置就要往这方面靠拢。其实许多著名的大学在通识教育方面都有好的做法,值得借鉴。例如,美国哈佛大学设立通识核心课程,注重文理交叉,包括外国文化、历史、文学与艺术、道德修养、自然科学、社会分析等6个领域,要求选课所占学分达到毕业要求总学分的1/4。北京师范大学把通识教育分解成哲学社会科学、人文、自然科学与技术、美学艺术、实践能力等五大类。北京大学也在建立一个相对稳定的文理科互选的课程系统,课程按学科大类分若干板块,规定学生必须在规定的不同板块(一般为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至少各修习一定门数或学分的课程。为此,我也曾邀集全国一些拔尖的学者编写“名家通识讲座书系”,即“十五讲”系列教材,已出版七十多种。各个大学的做法有一共同点,那就是试图把“全人类的文明经典”介绍给学生,拓展学生视野,使学生兼备人文素养与科学素养,把学生培养成全面发展的人。

通识教育是一种进步,可能从一方面活化大学办学的思维。长期以来,我们都习惯于以政治权威和意识形态为标准,对文化、科学的尊重仅限于工具与实证的领域,如今又几乎全受制于市场经济,所以办大学也眼界狭小,是工具性思维,这样的大学,难于起到为社会发展不断提供灵感和动力的效能。工具性思维指导下,所培养的人才也是视野褊狭、缺少创新能力的。中国经济这二三十年有飞速的发展,可是我们的大学所培养的在科技方面顶

尖的人才,是极少的,人文社科方面那就更惨,在国际上没有什么话语权。换一个思路,无论什么大学,都注重全人教育,博雅教育,然后才是专业教育,而且专业教育过程仍然不忘通识教育,让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水乳交融结合起来,那才有可能摆脱教育之困境,全面提升高校的教育质量,也有可能给“钱学森之问”交上答卷。

基于上面的认识,我对《经典解码:20世纪中国文学和电影》这本通识教材是看好的,认为黄万华教授和他们团队做了一件大好事,编了一本可用的教材。这本教材介绍给同学们的是20世纪中国优秀的文学与电影,那些已经或者可能成为经典的作品。这些作品记载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命运,积淀有我们民族的感情,是宝贵的传统。不要一讲传统就是理解为三皇五典、百宋千元,应当还有最近百年我们民族的智慧与精神。现代传统相对于古典传统可能不太为人所留意,但有可能更贴近当代的精神结构,弥漫于整个社会日常生活。看看这本教材所提供的那些丰沛的作品,就会感到现代文化传统多么值得珍惜,就会意识到目前社会上流行的所谓五四以来造成传统断裂文化虚空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无论几千年的传统还是近百年的传统,其根须都伸展到我们每个人的血脉之中,接触和学习经典,可以让我们的心安放,精神飞扬,更坚实而有力地面对未来。

这本教材让我赞赏,还因为编者的用心阐释,深入浅出,让普通大学生进入作品艺术世界,领略各种艺术风格与境界,得到审美愉悦,提升文学艺术鉴赏分析的能力。这也正合通识教育的要义。

前不久,我为参加自学考试的学员编过一本《中外文学作品导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即出),自然有些心得,由于那本书和这本教材有些类同之处,所以我想就怎样学习文学鉴赏性课程讲点意见,供同学们参考。

学会鉴赏优美的文学艺术作品,可以让自己具备博雅的气质。这个“博”可以理解为眼光与气度的开通博大,“雅”就是品味的高雅。专业不同,同学们不一定都要成为通晓艺术的专家,但气质风范必定是面向博雅的,这会令你们感到人生的充实。在当今趋向物质化、功利化、粗鄙化的氛围中,提倡博雅是有现实意义的。开设这样一门现代文学电影欣赏课,也有这方面的考虑:以这门课来激发学生阅读的兴趣,养成读书的习惯,化育博雅的气质,文学素养有所提高,整体素质也可以逐步得到提升。

学习这门课,要把读作品放到最重要位置,在这方面多花点功夫。教材的解读,也就是“解码”,是让大家大致知道可以从什么角度或者以什么方法去进入作品,可以提供一些阅读的思路和方式,但这些“解码”只是为了

打开思路,大家不一定去细读和死记硬背。这门课定位在“读”,主要功夫就是读作品。

如何去读?“第一印象”很重要,要获取整体感受,相信和珍惜自己的印象,不急于分析寻找什么意义主题之类。“解码”所点拨的意见不能代替自己的阅读感受,但可以给自己提示、启发,最好和自己的阅读感受做些比较,看是否吻合,并从中引发某些思考。读完作品,再展开一些探究,将阅读的感受、体验上升到理性层面思考,这就是鉴赏与评论。无论是教师教学,还是学生阅读,都要注意结合阅读印象和问题来分析作品,处处强调发掘与培育对文学的想象力、感受力和分析评判能力。

要重视和相信自己的阅读感受,注意积累不同的阅读体验,善于对不同的艺术风格做比较;对经典作品思想内涵的领会,要有一定的历史感,善于体验那种古今中外可能相通的情思与价值;不要“直奔主题”,也不要什么都用某个固定的概念与思维模式去简单“套解”;不能把鲜活的作品全都做冷冰冰的模式化的“分析”,然后简单而反复地套用某形容词去解释,必须在阅读作品有了自己的艺术感受的基础上去思考分析,把握每篇作品的艺术个性,把思路放开。

阅读作品时放松一点,不要一门心思总想着考试,想着问题和答案。文学属于精神生产,而精神现象是非常复杂的,文学分析也有多种可能性,不一定非得掌握什么“标准答案”,也不要求读一部作品全都能“通透理解”。我想此书所设计的各种“解码”,不过是示范某些方法,也并非要求大家“就此办理”。读过一篇作品只记得几条干巴巴的主题意义之类,最没有味道了。感受、体验与思考,在不断阅读中不断积累,也不断提升文学素养,这比什么都重要。

文学艺术鉴赏类课程所需要的是个性化的阅读和浸润式的学习,要发挥自己学习的自主性。在应试教育覆盖下的那种一切指向“标准答案”的学习,在这类课程中是要努力避免的。学了这门课,初步接触了现代文学与电影的经典,引发了阅读的兴趣,提升了自己的文学素养,思维能力、感受能力也长进了,何乐而不为呢?

阅读经典是一个涵养过程,需要沉下心来,“磨性子”。现在颠覆经典成了时髦,人们失去传统的尊严感,颠覆之下的“文化快餐”和垃圾太多,包围了青少年,他们不再有良好的阅读习惯。许多学生除了应对考试,读书其实很少,对经典作品阅读相当有限,即使有所接触,也不见得是经典原作,可能也就是上网读一些好玩的轻松的东西,包括“恶搞”的文字,这很容易受

到那种价值消解、相对主义甚至游戏人生的思想影响,而且把阅读品味也败坏了,这真有“终生受损”的危险。我们读经典,可以养成好的阅读习惯,要多读书,读好书,好读书,读整本的书。所以学习这门课是很有现实意义的,这不只是阅读经典的课,也是精神成长的课。

温儒敏

2011年12月1日于济南

目 录

- 序 言/1
- 第一章 文学的经典性阅读/1
 - 第一节 经典性阅读和治学/1
 - 第二节 经典解码的多种方法/13
- 第二章 20 世纪中国文学经典的生成与建构/26
 - 第一节 现代中国转型中的 20 世纪中国文学经典/26
 - 第二节 20 世纪中国文学经典的基本类型/30
- 第三章 百年中国电影/46
 - 第一节 中国电影的诞生与第一代影人的探索/47
 - 第二节 左翼电影运动与 1930 年代电影的繁荣/50
 - 第三节 战时中国电影的多元格局/57
 - 第四节 “十七年”与“文革”时期的红色电影/61
 - 第五节 代际更迭与新时期的电影景观/66
- 第四章 文本个案与解码实践/75
 - 第一节 小说经典解读/75
 - 《阿 Q 正传》/75
 - 《竹林的故事》/80
 - 《啼笑因缘》/83
 - 《边城》/87
 - 《迟桂花》/93
 - 《小城三月》/94
 - 《金锁记》/97
 - 《铁木前传》/103
 - 《酒徒》/107
 - 《游园惊梦》/112
 - 《棋王》/115
 - 《平凡的世界》/121

目 录

- 《现实一种》/126
《白鹿原》/131
《长恨歌》/137
第二节 诗歌经典解读/143
《死水》/143
《雨巷》/145
《再别康桥》/148
《我爱这土地》/151
《金黄的稻束》/153
《相信未来》/156
《回答》/159
《会唱歌的鸢尾花》/161
《山民》/164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166
第三节 散文经典解读/168
《故乡的野菜》/168
《秋夜》/170
《钓台的春昼》/173
《论西装》/177
《爱尔克的灯光》/180
《雅舍》/183
《水心》/186
《我与地坛》/189
《清洁的精神》/192
《风雨天一阁》/197
第四节 戏剧经典解读/201
《雷雨》/201
《上海屋檐下》/206
《茶馆》/212
《关汉卿》/217
《狗儿爷涅槃》/222
《天下第一楼》/227

目 录

第五节 电影经典解读/232

《马路天使》/232

《小城之春》/236

《早春二月》/241

《芙蓉镇》/246

《红高粱》/251

《悲情城市》/255

《阿飞正传》/261

《霸王别姬》/266

《站台》/271

后 记/277

第一章 文学的经典性阅读

第一节 经典性阅读和治学

一 经典性累积或消解:经典离我们有多远

“经典性阅读”既指阅读要选择好经典性著作,也指要用“经典解码”的方法认真展开阅读活动。

在所有的人文经典中,构成其核心的应是文学经典。2004年,在美国有“最为精细的细读者”之誉的范德勒,在极负盛誉的“杰佛逊讲演”上作题为《大洋、鸟和学者》的演讲,他指出,人文学科的核心教材,不应该是历史学家或是哲学家的文本,而应当是人类审美的努力的产物——文学和艺术,这是因为,人们通常记住任何一种文化,主要是通过这种文化里的文学艺术作品达成的。^①因此,解读、传承文学经典,是我们每个人应该具备的最重要的人文素质。然而,现实中却不断发生着经典价值迷失的情况。例如,当一些人狂热而随意地把“当代鲁迅”的“桂冠”抛向一个与鲁迅精神根本风马牛不相及的“媒体人”时,我们看到了鲁迅价值的当代迷失。

20世纪中国文学经典性作品的筛选、确认,不同于过去“儒家中国”传统中典律的建构。过去典籍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家权力的影响,国家权力的权威性时而要通过典籍的无可怀疑性来体现,而科举制度又将在典籍认定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教育系统置于国家权力直接而有力的影响之下。文学经典的认定大致也未摆脱上述因素的影响。或者说,文学经典的形成有着较大的非民间性。但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的形成,已经并将

^① 叶扬:《文学教育还有没有办法补救》,《上海文化》2010年6期。

继续呈现根本的差异性。

20世纪中国文学的经典性作品,大致是由三类作家提供的。第一类是已在目前的文学史著述中基本形成共识的文学大师,如鲁迅、茅盾、老舍、曹禺、巴金、郭沫若等创作的代表作;第二类是目前尚未被公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但其创作已明确指向经典地位的作家,如钱锺书、冯至、沈从文、张爱玲、穆旦、余光中、白先勇、金庸等,他们的创作也会提供经典性文本;第三类是一些重要作家提供的经典性或潜经典性文本,如海子、舒婷、北岛等的诗歌,他们最重要的作品,往往由于代表或引导了一个时代文学审美趣味的变化(而非失落),而在判断那个时代的审美标准及其价值时具有了重要的参照价值。

稍微留意一下第二、第三类经典性作品,我们就会发现,在它们产生的过程中,不仅已不存在过去历史上“强行”颁定经典的政治或宗教的势力,而且政治意识形态的灌输、控制也大大减弱了。经典性作品的形成越来越多地获得自身的自由,或者说,经典性作品的确认越来越成为文学民间的行为。而随着电子网络的普及,一般读者也越来越多地直接参与到文学经典的筛选中来,他们的评判往往直接左右着经典性作品的确认。

“经典性不是整个过程某一二个突出因素的结果……实际上经典化产生在一个累积形成的模式里”^①,在文学作品经典性累积的过程中,选辑、论述、改编构成最重要的环节。而一般读者在这三个环节上的参与也越来越明显。

选辑就是运用一定的选择原则,在某段时间里从众多作品中编选一套文本提供给读者,除了大系(包括文库、选集等)和文学教学课本等具有传统影响力的选辑外,文学评奖、评选、排行榜等选辑行为也日益具有影响力。而后者往往采用读者直接投票的方式。如香港《亚洲周刊》1999年的“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新浪网2005年的“中国文学60家”等有影响的评选都采用专家评审和读者投票决定入选作家、作品的方式,两者往往在“妥协”中决定了“经典名单”。例如“中国文学60家”的评选中,出现了不少专家和读者评价差异很大的作家最终入选的情况,如顾城,专家评分29分,读者评分却高达95分;三毛,专家评分仅22分,读者则给了85分。反之,李劫人,读者评分只有22分,但专家给了78分;赵树理的专家评分(高)和读者评分(低)的差异也高达30分。而即便有专家参与评审,读者的影响力

^① 斯蒂文·托托西:《文学研究的合法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44页。

也越来越大,如2010年设立的“郁达夫小说奖”,评委的评奖机制采用“实名投票,评语公开”的方式,网友跟帖评论,媒体全程参加。这些都说明,在选辑这一环节,读者的直接影响力正越来越大,甚至决定了一个作家、一部作品是否会从文学史视野中消失。

选辑认可的一套文本在提供给一般读者阅读、教学讲授、文学批评、翻译流通的过程中,还需要给主要由大学教师、文学批评者、文学史研究者等组成的诠释群体,通过各种形式的论述,包括各种评论、序跋、作家传记、文学争鸣、论战、文学史写作等,来逐步呈现作品的经典性内容,强化作品的经典性意义。论述这一环节过去专业性很强,但现在也开始出现某种“世俗化”倾向,尤其是文学、影视等争鸣,读者直接参与的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专业研究者的论述也越来越多地注意和广大读者的对话。

改编是指一部文学作品被改编成其他艺术形式(翻译不妨可以看成一种特殊的改编)。在这种形式的转换中,文学作品的经典性价值会得到丰富,原先被忽视,甚至被遮蔽的内容会得到揭示。因为改编往往有一种大众化趋势,文学作品被改编成更普及的形式,如画本、影视等;即便是“故事新编”一类改编,也往往是出于更易为当下读者观众所接受的目的,所以改编这一经典性因素累积的重要环节也有着民众的广泛参与。

这种对文学经典化的参与有着世界范围内“经典修正”的文化背景。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学界对于文学经典的形成、内容及意义就有种种挑战与修正,主要从过去被忽略的女性文学、少数族裔文学等角度,在课程设置与内容、文学史、文学作品选集等方面,把早先被认为是边缘的文本强化到文学教育、阅读中,使多样性、复杂性和矛盾性成为经典化的结构原则,目的是使经典建立于更开放的基础上,更广泛地进入大众文化消费、流通的领域。这种背景也影响到我们的文学阅读对于文学经典形成的参与。

总之,我们每个人都越来越广泛、直接地参与着文学作品经典化的进程,或者说,我们每个人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将为后世留下什么都负有责任,都需要回答“经典离我们有多远”这个问题。

然而,当文学经典的形成越来越成为文学民间的行为时,经典的权威性也遭到挑战。文本的典律化本来就属于一种选取性、排他性的文学评价运作,由于包括文学观念在内的意识形态的歧见和审美参照系的差异,任何一种文学典律的构建都很难被各方都认同,任何一套文学经典都难免遭受当代其他次群体或不同时代文化人的非议责难。当文学经典确认的民间操作性日益增强,“众声喧哗”的局面、“一个人的经典”的理论都可能将经典的

个人化行为推向极致,以致落入相对主义的泥淖,造成消解经典的结果。而大众文化及其研究的当代活力往往指向非精英化,大大削弱了知识精英对于文学经典的影响力,但同时也为重构经典准备了条件。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认真思考、回答“什么是经典”这一问题,让文学民间的行为推动文学经典性的累积,而不是造成经典性的消解。

二 开放的“经典性累积”思路:什么是文学经典

何为经典?经典最原初的意义是指某一文明体系中居于权威地位的宗教典籍,例如西方基督教文明的《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阿拉伯伊斯兰教文明的《古兰经》,中国儒教文明的“十三经”或“四书五经”。随着近代社会世俗化进程的展开,文学逐渐与宗教道统相脱离,文学经典也由附庸而蔚为大国。一般而言,所谓文学经典是指那些经过精心遴选或经过历史检验的,具有权威性和典范性的文学文本。普遍永久价值是理想的文学经典必须具备的首要条件:尽管任何文学经典都产生于特定的民族,但其普遍价值决定了它必将超越民族的疆界而成为全世界共享的文化财富;尽管任何文学经典都产生于特定的时代,但其永久价值决定了它的魅力决不会因时间的推移而黯然失色。必须指出,“应该如此”并不等于“本来如此”。作为“应该如此”的文学经典相当于一个先验范畴,而作为“本来如此”的文学经典则立足于经验,因而所涉及的问题也要具体复杂得多。

20世纪中国文学作为刚过去的文学时空,其广泛被承认的“恒态经典”并不多,甚至没有。我们接触到的多是经典累积形成过程中可视之为“动态经典”的文学存在。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就是要抓住那些已较清楚地指向经典地位的作家作品,在一定的文学价值体系中,予以初步的带有历史定位的呈现,为日后的经典性累积乃至确认提供重要基础。但文学经典的筛选、建构的重要内容并非单个文本的逐个确认,而是对整个经典价值体系的把握,因此,开放的“经典性累积”思路是重要的。

按照著名学者哈罗德·布卢姆的看法,世界性经典性生成的历史可以用“经典诞生于古代”、“经典辉煌于近代”、“经典衰亡于当代”来概括。^①古典人文主义宇宙观、人生观将自然生态规律与社会人文性予以合理协调,理智思辨和感性张扬这两翼俱在,甚至得到完美统一。于是产生了包括孔孟老庄、荷马史诗等在内的经典。近代人道主义张扬个性,解放人的主体

^① 参阅哈罗德·布卢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与不朽作品》,江康宁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

性,但同时,人的欲望膨胀也产生了种种危机;文学正是在正视这一现实中,在高扬个性自由的同时,深广地展现了物质满足与精神提升之间复杂而激烈的社会、心灵冲突,赢得了堪与古典人文作品相比的经典地位。当代经典衰亡的危机则源自围绕考试、文凭建立的现代教育制度,急功近利的学术评价机制和商业化、恶俗化的大众媒介对经典文化的冲击。这些显然能启发我们,保持深邃思辨的理性与生动活泼的感性,直面物质追求与精神提升的巨大矛盾,抵制现实对于经典文化积累的种种侵蚀,才能延续、丰富人类经典的生命。

20世纪人类文化的重要特征是随着人类社会空前的复杂,人对于自身的认识也前所未有地深化,文学表达的复杂性恰恰是与这两方面同步的。20世纪世纪文学的经典,比如《百年孤独》、《追忆逝水年华》、《尤利西斯》、《儿子与情人》、《古拉格群岛》等,都深化了人类对于自身本性的认识,在社会批判、心理探索中凸现了艺术光辉的永恒。20世纪中国文学是在跟世界文学对话的过程中展开其自身经典化的进程的,因此,是否深化了人类对于自身的认识,是否增强了人类表达自身的复杂性,也成为我们考察20世纪中国文学经典化进程最重要的参照系。

20世纪经典化的理论主要有两种:本质主义经典化理论将经典的构成条件限定于文学作品内部,强调经典的美学特质作为一种潜能客观存在于经典文本自身,读者的审美天性、性情与之相遇而将其激活,它坚决捍卫经典的审美价值的独立自主性和自律;建构主义经典化则认为并无普遍有效的美学原则,经典化在于建构,在于经典化的文化资本被谁占有,关注文化资本在历史演进中对作家、作品价值判断所起的作用,认为从女性、少数族裔如黑人或其他后殖民立场出发,会有不同的经典化结果。这两种经典化理论其实可以构成互补,正如马克思在论及古希腊艺术经典时所说:“困难不在于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困难的是,它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①无论是本质主义还是建构主义的理论,都会涉及文本的经典性因素的基本层面,一种无法同化的原创性,一种在不同的文学价值观的冲突、递变中的代表性,一种在历史传承中对后来者有巨大引导力的影响性等,都反映出文本的经典性累积倾向,是可以作为文本进入文学史的依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114页。

据的。

在上述背景下,我们可以展开对于 20 世纪中国文学经典的价值尺度的思考。

博尔赫斯这样说过:“经典是一个民族或几个民族长期以来决定阅读的书籍,是世代代的人出于不同的理由,以先期的热情和神秘的忠诚阅读的书。”^①这种“先期的热情和神秘的忠诚”正来自文学通过其自身的特性表现出来的民族认同感和文化凝聚力、感召力、感染力。

文学的自身特性即文学性主要是指文学通过情感性想象展示的生命之美。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种艺术思维不同于以逻辑推理揭示事物之真的科学思维,不同于以价值尺度追求人类之善的伦理思维,也不同于以偶像崇拜求得灵魂之安的宗教思维,它以富有个性化的情感性想象,在开阔、宽容的心灵视野中呈现具有丰富差异性的生命之美,其“真”、“善”也必须转化、升华为“美”才能被视之为文学的存在。正如米兰·昆德拉所强调:“发现唯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乃是小说存在的唯一理由。”^②发现唯有文学才能发现的东西,也才是我们发现文学经典存在的唯一理由。文学应该是人类包容力最深刻的传达和表现,超越了现实功利。但 20 世纪中国文学往往粘滞于现实社会政治、经济变动和由此关联的文化消费意向、方式等,尤其是政治的掌控更常常造成文学的失落,因此,在文学的价值尺度上应适当容纳进文学的超越,这种超越应该表现为作家对文学的殉道精神,对人性、人的生存状态与命运的深切关怀,对文学形式繁复性的痴醉探索。而当典律建构一旦在文学的层面上展开,文学传统也就不会被割断。

文学和政治的关系是 20 世纪中国文学最重要的课题之一,法国著名学者布迪厄尔正是在研究了 20 世纪中国文学后,才在他的文学场域理论中将“政治资本”列为影响文学形态生成的重要因素。我们在 20 世纪中国文学经典化过程中处理文学和政治的关系时,既要承认政治对于文学的重大影响,更要强调文学对于政治意识形态、作家对于自我意识形态的超越。20 世纪中国文学在不断走出社会政治化影响下的文学政治化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如文学被政治化一定会伤害文学本身,但政治倾向并非一定损害艺术,当政治倾向成为作家整个人生体验的有机部分,并在作家心灵中与作家对宇宙、生命、世界的深挚感悟融为一体时,政治被艺术化了。又如政治期

① 吴晓东:《从卡夫卡到昆德拉》,三联书店 2003 年,3 页。

②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年,6 页。